



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1

張西平 [意]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 (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田 大冢出版社



張西平 [意]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 (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梵蒂岡圖書館藏
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
文獻叢刊 (第一輯)

1

大象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1輯：全44冊 / 張西平等主編. — 鄭州：大象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347-7602-1

I. ①梵… II. ①張… III. ①文化交流—文化史—中國、西方國家—明清時代—叢刊 IV. ① K248.0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140828號

ISBN 978-7-5347-7602-1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一輯)

張西平 [意]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 (Ambrogio M. Piazzoni) 主編

出版人	王劉純
責任編輯	吳韶明 張前進
責任校對	牛志遠 裴紅燕 張迎娟 馬寧 安德華 毛路
書籍設計	杜曉燕
出版發行	大象出版社 (鄭州市開元路16號 郵政編碼 450044)
發行科	0371-63863551 總編室 0371-65597936
網址	www.daxiang.cn
印刷	鄭州新海岸電腦彩色製印有限公司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開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張	1940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價	29800.00元 (全44冊)

若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承印廠聯繫調換。

印廠地址 鄭州市文化路56號金國商廈七樓

郵政編碼 450002 電話 0371-63601610

項目名稱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
項目來源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類項目 中央文化產業發展專項資金資助項目
項目出版合作單位	中國大象出版社 梵蒂岡圖書館
項目承擔單位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 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創新中心
項目支持單位	北京外國語大學 中國社會科學院基督宗教研究中心

編輯委員會

學術顧問 戴逸

主編 張西平 [意]馬西尼 (Federico Masini)

任大援 [意]裴佐寧 (Ambrogio M. Piazzoni)

編委會成員 卜鍵 于沛 王劉純 石云里 成崇德 朱誠如 余東

(按姓氏筆畫排序)

汪前進 卓新平 [意]保羅 (Paolo De Troia) 馬大正 耿相新

徐兆仁 [意]麥克雷 (Michele Ferrero) 張柏春 張朝意 董中山

鄒愛蓮 楊慧玲 戴寅 謝輝 [意]蘇國怡 (Carlo Socol)

編委會執行秘書 謝輝

論明清之際『西學漢籍』的文化意義（代序）

明清之際從時間上說大體是晚明崇禎朝到清順、康、雍時期。黃宗羲用『天崩地解』來形容這一時期的早期階段，所言極是。這一時段，國內明清鼎革，歷經滿漢政權轉化與文化巨變，世界範圍正經歷15世紀末期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西方文化與體制在全球的擴張。文化相遇與衝突以多重形式展開。其影響波及今日之世界。

對中國和西方關係來說，最重要的事件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從印度洋和太平洋來到東亞，耶穌會入華。由此，拉開了中華文明和歐洲文明在文化與精神上的真正相遇。著名漢學家許理和認為，17至18世紀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段最令人陶醉的時期：這是中國和文藝復興之後的歐洲高層知識界的第一次接觸和對話』^①。

一

正是在這次文化相遇與對話中，來華的傳教士將刊書作為傳教的重要手段。利瑪竇說：『基督教信仰的要義通過文字比通過口頭更容易得到傳播，因為中國人好讀有任何新內容的

書。』『任何以中文寫成的書籍都肯定可以進入全國的十五個省份而有所獲益。而且，日本人、朝鮮人、交趾支那的居民、琉球人以及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能像中國人一樣地閱讀中文，也能看懂這些書。雖然這些種族的口頭語言有如我們可能想象的那樣，是大不相同的，但他們都能看懂中文，因為中文寫的每一個字都代表一樣東西。如果到處都如此的話，我們就能夠把我們的思想以文字形式傳達給別的國家的人民，儘管我們不能和他們講話。』^②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天主聖教書目·曆法格物窮理書目》中，明確說出傳教士刻書傳教之目的：『夫天主聖教為至真至實，宜信宜從，其確據有二：一在外，一在內。在內者，則本教諸修士著述各端，極合正理之確論。其所論之事，雖有彼此相距甚遠者，如天地、神人、靈魂形體、現世後世、生死等項，然各依本性自然之明，窮究其理，總歸於一道之定向，始終至理通貫，並無先後矛盾之處。更有本教翻譯諸書百餘部，一一可考，無非發明昭事上帝，盡性命之道，語語切要，不涉虛玄。其在外之確據，以本教之功行蹤跡，目所易見者，則與吾人講求歸復大事，永遠禍福，闢邪指正而已。至若諸修士所著天學格物致知、乾象曆法等書，亦有百十餘部，久行於世，皆足徵天主聖教真實之理。願同志諸君子歸斯正道而共昭事焉。』^③

由此，自明清之際開始，在中國的歷史文獻中出現了一批新的類型的書籍，即翻譯、介紹與回應歐洲文化宗教的漢文書籍^④。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

『明末有一場大公案，為中國學術史上應該大筆特書者，曰：歐洲曆算學之輸入。先是

馬丁·路得既創新教，羅馬舊教在歐洲大受打擊，於是有所謂「耶穌會」者起，想從舊教內部改革振作。他的計劃是要傳教海外，中國及美洲實為其最主要之目的地。於是利馬竇、龐迪我、熊三拔、龍華民、鄧玉函、陽瑪諾、羅雅谷、艾儒略、湯若望等，自萬曆末年至天啓、崇禎間先後入中國。中國學者如徐文定，名光啓，號元扈，上海人，崇禎六年（1633）卒，今上海徐家匯即其故宅。李涼庵名之藻，仁和人。等都和他們來往，對於各種學問有精深的研究。先是所行「大統曆」，循元郭守敬「授時曆」之舊，錯謬很多。萬曆末年，朱世堦、邢雲路先後上疏指出他的錯處，請重為厘正。天啓、崇禎兩朝十幾年間，很拿這件事當一件大事辦。經屢次辯爭的結果，卒以徐文定、李涼庵領其事，而請利、龐、熊諸客卿共同參預，卒完成曆法改革之業。此外中外學者合譯或分撰的書籍，不下百數十種。最著名者，如利、徐合譯之《幾何原本》，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無用我再為讚歎了。其餘《天學初函》、《崇禎曆書》中幾十部書，都是我國曆算學界很豐厚的遺產。又《辨學》一編，為西洋論理學輸入之鼻祖。又徐文定之《農政全書》六十卷，熊三拔之《泰西水法》六卷，實農學界空前之著作。我們只要肯把當時那班人的著譯書目一翻，便可以想見他們對於新知識之傳播如何的努力。只要肯把那個時代的代表作品——如《幾何原本》之類擇一兩部細讀一過，便可以知道他們對於學問如何的忠實。要而言之，中國知識線和外國知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中國元代時和阿拉伯文化有接觸，但影響不大。在這種新環境之下，學界空氣，當然變換，後此清朝一代學者，對於曆算學都有興味，而且最喜歡談經世致用之學，大概受

利、徐諸人影響不小。』^⑤

梁公這段論述有兩點十分重要：其一，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是繼佛教傳入中國後，中華文明與外部世界知識最重要的一次接觸。他從中國歷史的角度將明清之際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定位，對其評價的視野與高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二，對傳教士與文人所合作翻譯的西學漢籍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是「字字精金美玉，為千古不朽之作」。

梁啟超對這批書籍並未統一定義，學界也有用「漢文西書」來定義者^⑥，這個定義尚不能全面概括這類文獻的特點。一是在文獻呈現形式上，這類文獻並非全部以書的形式出現，其中含有大量手稿、輿圖等；二是從文獻內容上，不僅有大量向中國介紹西方的學術和知識的內容，也有傳教士用中文寫作，研讀中國文化的文獻，例如白晉的漢文《易經》手稿。同樣，將其定義為「漢語天主教文獻」過於狹小，因為其內容已經大大超出單純的天主教範圍，儘管天主教文獻是其重要部分^⑦。我們認為用「西學漢籍」較為穩妥。目前學術界已經不再將「漢籍」僅僅理解為中國士人在歷史上的出版物，凡是用漢文書寫的歷史文獻都可稱為漢籍^⑧。這些我們在下面介紹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時再具體展開。

對這批文獻的整理史，最早可以追述到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楊廷筠所編的《絕徼同文紀》，書中收入了中國文人與部分來華耶穌會士為西學漢籍所寫的七十篇序言以及七篇明朝關於處理來華傳教士的公文，這些序言涉及傳教士所出版的西學漢籍二十五部。楊廷筠在序言中說：「知六經之外自有文字，九州之表更有畸人，由是紀以索觀其書，由讀書以接遺

其人。』^⑨儘管《絕徼同文紀》以西學漢籍的題跋序言為主，但開啓了對西學漢籍的整體收集與整理。

李之藻在明天啓三年（1623）編成的《天學初函》中，收錄了傳教士和中國文人的著作二十種，其中「理編」十種，「器編」十種。收入理編的有：《西學凡》、《唐景教碑附》、《重刻畸人十篇》（附西琴曲意八章）、《交友論》、《重刻二十五言》、《天主實義》、《辯學遺牘》、《七克》、《靈言蠡勺》、《職方外紀》；收入器編的有：《泰西水法》、《渾蓋通憲圖說》、《幾何原本》、《表度說》、《天問略》、《簡平儀說》、《同文算指》、《圓容較義》、《測量法義》、《句股義》。他在《天學初函》的序中說：「時則有利瑪竇者，九萬里抱道來賓，重演斯義，迄今又五十年，多賢似續，翻譯漸廣……顧其書散在四方，願學者每以不能盡睹為憾。」^⑩康熙朝後西學影響日益擴大，後因「禮儀之爭」，特別是雍乾禁教後西學日漸式微，但作為一種新的知識，對於這批文獻官方仍不能忽視。在四庫館臣看來，「西學所長在於測算，其短則在於崇奉天主，以炫惑人心」^⑪，這樣它僅收入西學漢籍二十二種。對於西學漢籍中的非科學類書籍，《四庫全書》是「止存書名」，不收其書，這樣有十五種西學漢籍被列入《存目》之中，其中收入子部雜家類的十一種，收入史部地理類的兩種，收入經部小學類的兩種^⑫。

生於1620年的中國文人劉凝，弱冠入縣學^⑬，一生未得功名。他編輯的《天學集解》，涉及西學漢籍的有二百八十四篇，分為首集、道集、法集、理集、器集、後集^⑭。儘管是手稿，尚未出版，但已是當時收集最全面的西學漢籍序跋集^⑮。劉凝編輯的這些序跋大部分撰寫於

1599—1679年間。

『刊書傳教』已成為利瑪竇所確立的『適應路線』的重要舉措，從教內各類書目也可以看出這批『西學漢籍』的傳播，上面提到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的中文書中有文獻專門記載了這批圖書^{①⑥}，編號為 RACCOLTA GENERALE-ORIENTE Stragrandi. 13a。其中，《天主聖教書目》著錄了宗教類著作一百二十三種，《曆法格物窮理書目》著錄了八十九種西學漢籍文獻，共著錄了二百一十二種文獻。

《聖教信證》是張賡和韓霖合寫的一部書，書中編入來華傳教士的漢文著作，以表達『冀後之同學者續輯，以誌源源不絕之意』^{①⑦}。全書記述了九十二名傳教士的簡要生平和二百二十九部西學漢籍。同治年間的胡璜著《道學家傳》有著很高的文獻學價值，全書共記錄了傳教士八十九人，其中有中文著述的三十八人，共寫下中文著作二百二十四部。

與此同時，在中國文人所編的各種書目和叢書中也開始著錄西學漢籍的圖書^{①⑧}。據初步研究，共有十二種書目著錄了西學漢籍一百三十八部^{①⑨}。

同時，隨著歐洲天主教修會進入中國，各地教徒的增加，各地修會也開始翻刻耶穌會所出版的書籍，中國信徒也開始翻譯和編寫、出版各類西學書籍^{②⑩}。

在西方漢學界，最早注意來華耶穌會中文著作的是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由於和來華耶穌會士有著密切的關係，他於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圖說》中，首次向歐洲介紹了入華傳教士的中文著作，其中包括利瑪竇、羅雅谷、高一志等人的書籍^{②①}。

明末清初來華傳教士究竟出版了多少西學漢文書籍？究竟寫作並留下了多少西學漢文手稿？這些學術界至今尚無定論。

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 1849—1925）1901年所編寫的《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在中國的出版書目》（*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en Chine: bibliographie des ouvrages publiés en Chine par les Européens au XVIIe et au XVIIIe siècle.*），著錄了明清之際的西學漢籍三百六十三種。

法國漢學家、著名的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裴化行（Henri Bernard），1945年在《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第十卷上發表了《從葡萄牙人到廣東至法國傳教士到北京期間歐洲著作的中文編譯書目（1514—1688）》（*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venue des Portugais à canton jusqu'à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1514-1688*）一文^{②②}，在這篇文章中，記錄了三十八位傳教士的姓名，其中三十六人有中文著作，共二百二十六種。1960年在《華裔學志》的第十九期，他又發表了《從法國傳教士到北京至乾隆末期歐洲著作的中文編年書目（1689—1799）》（*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Bibliographie chronologique depuis la foundation de la mission française de Pékin jusqu'à la mort de l'empereur K'ien-long, 1689-1799*）一文，並整理出《北京刊行天主聖教書板目》、《曆法格物窮理書板目》、《福建福州府欽一堂刊書板目》、《浙江杭州府天主堂刊書板目錄》四篇目錄。這四篇目錄共刊錄了三百零三種文獻。

由馮承鈞所譯的法國籍中國基督教史研究專家費賴之（Louis Pfister）1932年所作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是一部研究入華傳教士的重要工具書，他把傳教士的中文和西文的文獻統一編目，提供了入華耶穌會士中文文獻的重要而又豐富的信息。《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中共有六十三人寫了三百六十六種中文文獻^{②③}。

《法國國家圖書館館藏中國圖書目錄》（*Catalogue de Livres Chinois Coréens, Japonais, etc*）是1912年由法國人古郎（Maurice Courant）所作，古郎書目共收入了九十九名作者的明清天主教文獻三百七十四種^{②④}，這些作者中包括耶穌會傳教士五十六人，方濟各會、道明會、奧斯定會等其他修會的傳教士十五人，中國士人二十八人。這三百七十四種文獻中，有作者署名的文獻有二百七十八種，無作者署名的文獻有九十六種^{②⑤}。

徐宗澤所編《徐匯書樓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收錄文獻達四百零二種。其中基督教宗教類著作達二百九十六種，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四；屬於自然科學技術方面的著作共六十二種，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五；關於中西哲學、政治、教育、社會、語言文學藝術方面的共三十一種，約佔總數的百分之八；傳教士奏疏等歷史文獻共十三種，約佔百分之三。譯著書籍的主體是宗教類文獻，其次是自然科學技術類文獻。《巴黎國立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錄》著錄了七百六十種，基本是宗教、神哲學類譯著文獻。《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及中國公教學者譯著書目》

有一百六十九種⁽²⁶⁾。

由方豪主編的《上智編譯館館刊》，於1947年發表了馮瓚璋編《北平北堂圖書館暫編中文善本書目》，初步統計共著錄了一百零三部西學漢籍。其中漢文天主教著作八十六部⁽²⁷⁾，滿文天主教著作三部，農家類一部（熊三拔《泰西水法》），天文曆算類八部（南懷仁《妄占辯》、《靈臺儀象志》，湯若望《交食表》二部、《交食曆指》，羅雅谷《月離表》、《月離曆指》、《日躔曆指》），雜家類四部（傅汎際《名理探》，高一志《空際格致》、《童幼教育》、《平治西學》），集部一部（徐昌治訂《破邪集》）⁽²⁸⁾。

據錢存訓統計，明清之際耶穌會傳教士在華兩百年間共翻譯西書四百三十七種。其中純屬宗教的書籍二百五十一種，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七；屬自然科學的書籍一百三十一種，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屬人文科學的書籍五十五種，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三⁽²⁹⁾。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著錄西學漢籍三百二十一種。李天綱估計明末清初關於天主教的文獻應該不少於一千種⁽³⁰⁾。

二

雍乾禁教以後，天主教發展處於低潮，從而使得許多天主教方面的書只有存目，不見其書，到清末時一些書已經很難找到，如陳垣先生曾說：「童時閱四庫提要，即知有此類書，四庫概屏不錄，僅存其目，且深詆之，久欲一睹原書，粵中苦無傳本也。」⁽³¹⁾

由此，從民國初年至今，中外學者為收集和整理這批文獻，進行了長達一百多年的努力。馬相伯是清末民初的風雲人物，晚年時極力主張天主教的本色化，他在明末清初的入華耶穌會的中文著作中找到了心中的理想，「找到一種天造地設的契合，而利所譯最切近這理想」^{③2}。

馬相伯因此對這批文獻的收集十分重視，他曾寫下了《重刊〈辯學遺牘〉跋》、《重刊〈主制群徵〉序》、《書〈利瑪竇行跡〉後》、《重刊〈真主靈性理證〉序》、《重刊〈靈魂道體說〉序》、《重刊〈靈言蠡勺〉序》等多篇有關整理明末清初天主教文獻的文字。在他和英斂之等人的通信中，他曾提到自己過眼的明清天主教文獻達二十六部之多^{③3}。為做好這件事，他和英斂之、陳垣多次通信，對陳垣的工作倍加賞識，在給英斂之的信中說「援庵實可敬可愛」^{③4}。在推動明清天主教文獻的整理方面，馬相伯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英斂之早年正是讀了利瑪竇、艾儒略等人的書後才加入了天主教。民國初年，他經十餘年努力找到了《天學初函》的全本，並重新刊印其中的部分文獻。他在重刊《辯學遺牘》的序言中說：「《天學初函》自明季李太僕之藻匯刊以來，三百餘年，書已希絕。鄙人十數年中，苦志帙^{③5}羅，今幸覓得全帙。內中除器編十種，天文曆法，學術較今稍舊，而理編則文筆雅潔，道理奧衍，非近人譯著所及。鄙人欣快之餘，不敢自秘，擬先將《辯學遺牘》一種排印，以供大雅之研究。」^{③6}

馬相伯、英斂之、陳垣三人中當屬陳垣學術成就最高，他發表《元也里可溫教考》而一舉成名，奠定了中國天主教史研究的基礎，在明清天主教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上他也著力最大。

陳垣不僅整理和出版了入華傳教士的著作，如《辯學遺牘》、《靈言蠡勺》、《明季之歐化美術及羅馬字注音》、《利瑪竇行跡》等，而且在教外典籍中發現了許多重要的文獻。他所寫下的《從教外典籍見明末清初之天主教》、《雍乾間奉天主教之宗室》、《涇陽王徵傳》、《休寧金聲傳》、《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華亭許纘曾傳》、《湯若望與木陳忞》等一系列論文，不僅在學術上大大加深了天主教入華傳教史的研究，在歷史研究和文獻研究上也開闢了一個嶄新的領域。陳寅恪在陳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序言中說：『中國乙部之中，幾無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實自近歲新會陳援庵先生之著述始。』⁽³⁷⁾這說明了陳垣先生在中國宗教史特別是中國基督教史上研究的地位。

陳垣先生在談到這批文獻的整理時，認為應該繼承李之藻的事業，把《天學初函》繼續出版下去。在給英斂之的信中，他說：『頃言翻刻舊籍事，與其倩人繕抄，毋寧逕將要籍借出影印。假定接續《天學初函》理編為天學二函……三函……分期出版，此事想非難辦。細思一過，總勝於抄，抄而又校，校而付排印，又須再校，未免太費力。故擬仿涵芬樓新出《四部叢刊》格式，先將《超性學要》廿一冊付影印，即名為天學二函，並選其他佳作為三函，有餘力並覆影初函。如此所費不多，事輕而易舉，無繕校之勞，有流通之效，宜若可為也。乞函商相老，從速圖之。此事倘行之於數年前，今已蔚為大觀矣。』⁽³⁸⁾

為此，陳垣曾肆力搜集有關史料，並計劃仿《開元釋教錄》及《經義考》、《小學考》體制而為《乾隆基督教目錄》，為中國天主教的文獻作一次全面的清理，也為《四庫全書總目》

補闕拾遺。這一計劃最終僅完成了一部分，即附刊在《基督教入華史略》後的《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這個目錄雖然限於當時的條件只收集了有關天主教士的教理和宗教史的部分，尚未收錄天文、曆算、地理、藝術等方面的傳教士重要的著述，但在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之前，他的這份目錄是當時搜集天主教文獻最多的一個目錄，其中未刊本較多於已刊，由此可見其搜訪之勤。

正是在馬、英、陳三人的努力下，民國初年在這批文獻的收集和整理、出版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向達先生是治中外關係史的大家，他在敦煌學、目錄學等方面的貢獻大都為學界所知，但他在收集和整理明清間入華天主教教史文獻上的顯著成績，卻多不為人所知。在這方面，他不僅寫下了《明清之際中國美術所受西洋之影響》等重要的論文，還整理和收集了部分天主教史的書籍。其點校的《合校本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跡》，是他把法國、羅馬等地的幾個刻本統一校勘後而整理出來的，很長時間內是最好的校本。他自己還收藏了許多珍本，《上智編譯館館刊》曾公佈過覺明先生所藏有關天主教書目。

王重民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目錄學家、文獻學家、敦煌學家，他在明清天主教文獻的收集和整理上有著重要的貢獻。1934年他和向達先生被北平圖書館派往歐洲進行學術考察，在歐洲訪問期間，他把收集明清天主教文獻作為其在歐洲訪書的第二項任務。他在訪問巴黎的法國國家圖書館和羅馬的梵蒂岡圖書館時，對這類書格外關注，並從歐洲帶回了部分重要文獻。